

工厂龙门阵

2012年11月 第6期

- 国家、资本和劳动者在社保问题上有着怎样的利益纠葛？
社保如何能够按照最符合工人利益的方式来管理？
- 工人 · 技术员 · 小白领 · 管理层的生态。
- 在“企业文化”和实际好处之间……
- 斗争中，工人和老板各自会怎么看待“良心”和“情面”？
- 龙门特刊：韩国战斗性工人全泰一小传
- 本期继续连载山东二妮的的打工故事和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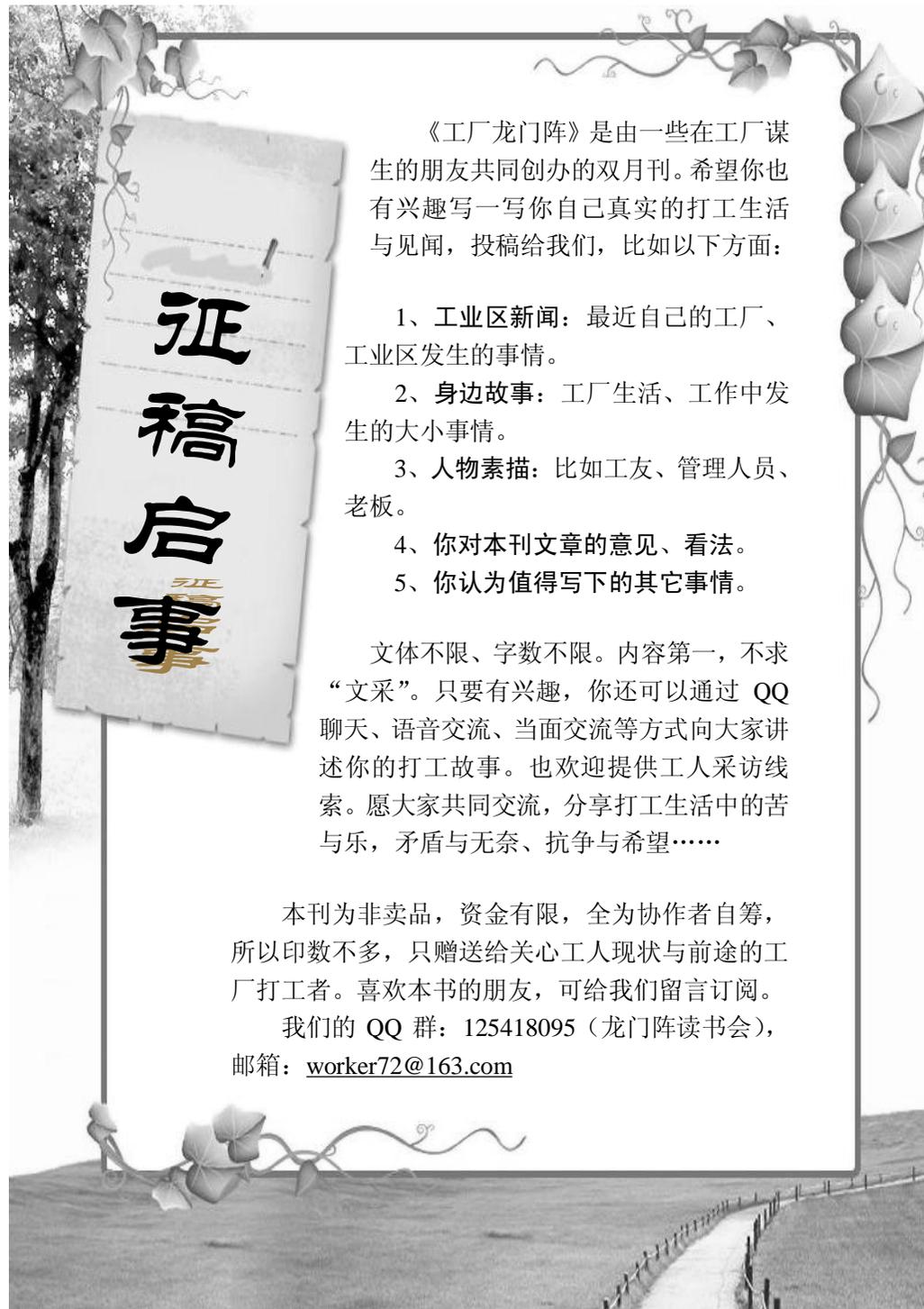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工厂龙门阵》就是说说工厂里的事。
正是这些琐碎平常的事件、场景、喜怒哀乐，
构成了工人的生存环境，也塑造着工人
的主观意识，触发和影响工人的行动。



★ ★ ★ 本期目录 ★ ★ ★

时事评论	从社保看国家、资本、劳动者的利益纠葛.....王晓林	1
工厂生活	跟钱相关的几件“大事”.....莞婕	4
	深圳两厂打工记.....归属感在哪	6
	工厂的一天.....行者	9
人物素描	工友老翟.....老胖	11
	主管.....马微	14
二妮专栏	我的临时工生活(之三).....山东二妮	16
	临时工琐记(之三:打工百态).....山东二妮	18
工人访谈	我做拉长那些年.....阿平讲述 向日葵整理	20
	小莲大姐.....访谈者:茶先生	22
	我们厂的文化生活.....小芳讲述 向日葵整理	23
工人行动	老板的“脸面”.....王晓林	24
文艺天地	老板的心.....木萧萧	27
	换厂心情.....浪子	27
龙门特刊	韩国战斗性工人全泰一小传.....若林	28
征稿启事封三	



《工厂龙门阵》是由一些在工厂谋生的朋友共同创办的双月刊。希望你也有兴趣写一写你自己真实的打工生活与见闻，投稿给我们，比如以下方面：

- 1、工业区新闻：最近自己的工厂、工业区发生的事情。
- 2、身边故事：工厂生活、工作中发生的大小事情。
- 3、人物素描：比如工友、管理人员、老板。
- 4、你对本刊文章的意见、看法。
- 5、你认为值得写下的其它事情。

文体不限、字数不限。内容第一，不求“文采”。只要有兴趣，你还可以通过 QQ 聊天、语音交流、当面交流等方式向大家讲述你的打工故事。也欢迎提供工人采访线索。愿大家共同交流，分享打工生活中的苦与乐，矛盾与无奈、抗争与希望……

本刊为非卖品，资金有限，全为协作者自筹，所以印数不多，只赠送给关心工人现状与前途的工厂打工者。喜欢本书的朋友，可给我们留言订阅。

我们的 QQ 群：125418095（龙门阵读书会），
邮箱：worker72@163.com



社保的作用，是保证工人在丧失或无法出售劳动力的期间，仍能维持生活。丧失劳动力的原因有：生病；得了工伤、职业病；女工怀孕、生育、哺乳；失业；年老退休。因此社保被分为养老、工伤、医疗、生育、失业几个险种。

看起来，社保对打工者是有好处的，比如看病、女工生育可以报销一部分费用（医疗、生育保险）；工伤了可以免费治疗，并得到一些赔偿（工伤保险）；交够若干年（目前是15年）的养老保险，退休后可以享受养老金（养老保险）；等等。

那么中国的社保水平如何呢？直到八十年代，国营单位的正式职工全部由单位缴纳社会保险。这无疑比现在优越得多。可惜当时的工人也被分了三六九等，社保只覆盖“全民所

有制”单位，其它“集体”企业、社队企业等等就没有。农村同样没有，仅少数“五保户”可以保吃、保穿、保医、保住、保葬。尽管如此，这点待遇也被市场改革的春风吹得七零八落。改革开放后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私企和多数外资都没有给员工（尤其是外来工）买社保。

彻底确立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之后，依靠国企的根基和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代加工产业，中国快速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工厂地位，涌现了一支上亿的工厂工人队伍，给老板们创造了天文数字的利润。要维持这个地位，就要保证供应充足的廉价劳动力。作为一项相关措施，在原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国企改制而部分瓦解之后，近几年，国家又开始在私人工厂推广社保了，力度越来越大。

为什么说，推广社保有助于维持中国“世界工厂”的地位？

首先，它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，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有限的改良。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，工人工资要么原地不动，要么赶不上物价涨得快。教育、医疗的市场化改革，令越来越多普通家庭“上不起学，看不起病”，和飞升的房价一起构成了“新三座大山”。从工人方面来说，工业大发展的同时，生产安全、劳动保护却出现大倒退，工伤、职业病泛滥成灾，伤病工人往往陷入困境甚至绝境

（例如工伤工人刘汉黄因得不到赔偿而杀死老板）。出于维护剥削秩序，缓和劳资矛盾的需要，重建社保体系终于提上国家的日程。这既能化解一部分矛盾，同时也帮助老板避免一部分的风险。例如工伤保险，其实是国家与整个资产阶级一起出钱，为那些可能出现的风险事故买单。

其次，健全的社保体系有助于保证最低限度的购买力，这样在发生经济危机时，市场需求不至于缩减得太快、太厉害，从而缓解危机对企业的冲击。对国家来说，这就是失业保险的主要价值。当某个工业部门开始发生关厂和大规模裁员时，假如工人能够领到失业金（尽管低于他的劳动收入），就能维持一定的消费，不会造成消费品制造业跟着大幅萎缩，危机也就可能不会发展得太快。不过，中国目前因为就业充分，而且普通工人多半也没有失业保险，所以能“享受”到失业金的屈指可数。但从失业金制度的创设思路来看，它和其它社保一样，应该发挥“收入再分配”的作用，也就是迫使老板出一点钱，由工人来消费。

国家开始重视社保，除了前面说过的理由之外，也因为社保收上来的钱是真金白银，在需要“刺激经济”保证老板有钱赚的时候，把社保钱“借”去用一下，不会像印钞票那样留下通货膨胀的后遗症。

虽说社保制度对老板有这么多的好处，可是老板的心里，还是宁可一分钱都不要交才好。当然这话不好说出口，毕竟全世界有社保的地方，老板总是要出点血的，所以记者专家们往往拐弯抹角地宣称：政府不该“加重企业负担”，你收了这么多税，就应当把社保的担子扛起来！2007年《劳动合同法》出台的时候，老板们之所以大为紧张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：签了合同，社保可能就逃不掉！但为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，国家和老板最终还是要通力合作的。为了帮助一些企业降低用工成本，不少地方政府在社保问题上搞折衷，例如放任工厂不买社保，或只买一部分。在东莞的某些地方，企业还可以跟当地政府就买社保的比例讨价还价。

工人则纠结得很：通常年纪大的工人最关心社保；年轻人往往不在乎；许多工人对社保没信心，或不愿“平白”从不多的工资里被挖走一笔钱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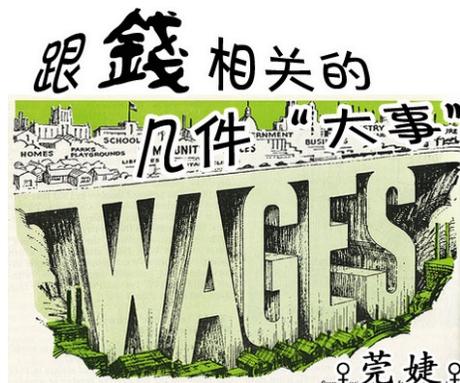
工人“对社保没信心”不是没有理由的。在各类社保中，有关养老保险的争议最多。它涉及金额庞大，并且事关政府、老板和工人的三方利益。这几年，养老保险惹出来的工人抗议实在不少，国家也比较注意在这个问题上的“舆论引导”。

2012年9月12日，人民日报发了篇文章“参加养老社保其实很划

算”，简直像保险推销员的口气，声称买养老保险“比存款划算”，收益要高。可是，划算到什么程度呢？让我们拿另一篇报道“证实”一下。11月10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报导，深圳某工人“社保缴费19年退休时养老金1220元”。我们都知道1220元意味着什么：深圳最低工资1500元，一线员工加班加点一个月拿到3000元左右才能勉强养家。1220元，真的只是勉强够吃饭了。这事情引起了激烈讨论。最后社保局解释说，因为该员工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缴费，所以养老金低。可是，全国的私企，普通工人不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缴费吗？那么到我们退休的时候，是否都只能拿到区区一千多的退休金？但就算是这么低的养老金，真正享受到的人也还不多，尤其是私企的工人，

多半都是这十年来才陆续有了社保。就算是这么低的退休金，国家还在嚷嚷“难以负担”啊，要延迟退休啊……现在政府还在考虑让养老金入市（也就是拿工人的养老钱去投资、买股票等），毕竟钱不是这些官员、老板的，他们花着也不心疼。可是，对于工人来讲，那点钱是决定自己干不动活了、退休了之后是吃白米饭还是喝稀饭的问题。

说到底，社保等于给全体受雇劳动者推迟支付的工资，钱是工人自己的，只不过把今天的钱留到明天花罢了。可问题是，工人对社保政策的制订，对这笔“工资”的收缴、保管、使用、分配，都完全没有发言权，也无法监督。除非工人显示出集体力量，否则社保不可能按照最符合工人利益的方式来管理。



说是大事，不过是因为它跟钱相关罢了。在外打工，挣钱是第一大事，所以，跟钱相关的事儿都是大事。

第一件。虚报加班。都知道，工厂的工资主要是靠加班费，即便是一般的文职人员、小白领也是如此。我们厂的工程师底薪也不过两千出头，所以就要尽量加班。这个厂的好处就是，至少加班费还是遵照劳动法来算的：平常加班1.5倍，周末2倍，节假日3倍。刚好今年中秋和国庆连到一块儿，加上周末，总共8天假。这8天都加班的话，其中4天算三倍工资（中秋1天+国庆3天），另外4天算2倍工资。虽然放假不容易，但挣两倍、三倍工资更不容易啊！办公室人员比产线人员的一个优势是，但办公室人员可以根据“工作需要”，选择自愿加班。所以，一到国庆长假，很多人都“自愿”加班了。工厂的规定是，加班要有理由。但理由总是能

找的，于是乎，就有人想办法报了加班，但加班那天人却不去，只是叫人代打卡。办公室的特点就是，明争暗斗，谁看谁都不爽，于是就有人匿名举报，把姓名、时间都列出来了，还说“如果不处理这件事，就继续向更上层举报”。工厂为约束管理层，制定了一系列复杂的制度，由于内部邮箱都是用自己的姓名的，任何员工都可以直接给董事长之类的高层长官发邮件，所以一旦被人举报违规，相关部门是不敢随意包庇的。

工厂有明文规定，如果发生代打卡的情况，双方都要被开除。这事的后果是，几个没有“后台”的人被开除；而两个老板比较器重的人，被老板“保”留了下来。后来另一个部门也发生类似的事情。工厂为这事，专门修改了员工手册，规定虚报加班要记大过。这些事公开后，其他职员一片恶骂：“他妈的，混蛋”，“举报那王八蛋脑袋进屎啦，关他屁事，又不用他出钱”，“混蛋，老板赚那么多，混点加班费又怎样？跟他有一毛钱关系？”不知道那个听到本部门同事恶骂的举报人，此时感受如何。总之这让办公室的白领们挺寒心，敌人就在身边，可你不知道他是谁。也就是说，身边的每一个人——包括那些每天对你笑眯眯的人——都要十分小心，不要被抓住了把柄。

第二件。扣绩效。其实绩效都不是很高，即便是老员工也不过四百多

块钱而已。不过“老板”们（办公室里，通常都称本部门最大的管理，及以下的管理做“老板”）有时候气急了，又拿那些下属没办法，就会很没风度地跳脚：“如果不×××，就扣绩效……”这种做法听起来挺好笑，而且其实很多白领都挺上进的，还是会尽力去干好自己的事情，扣绩效奖并不一定能给他们更多动力。不过这次就有人较真了，正儿八经地在邮件里回复到，“我反对扣绩效！”然后罗列了若干种把这项工作办好的方法，并且在部门兄弟们都在的邮件组里公开回复。这也算是破天荒头一次了。其他人都很惊讶，事后用各种方式对这种方式表示支持，感觉“总算出了口气”。后来老板也没再说什么。那人的直属上司私下找到他，和气地说：“老板说扣绩效只是说说而已，不会真扣。你也别较真儿。”他当然知道未必会扣绩效，不过，毕竟有人表示不满，老板们也知道弟兄们对此不满，估计此后会慎用此计。

另一次关于绩效的问题。文员小利去找另一个部门的人签一份文件，这事需要麻烦到那个部门的人。那个部门的女职员一看就绷着脸，说什么：“每次你们拉了屎都让我们来擦屁股！”小利纳闷道，我啥时候让你擦屁股了！那女的不依不饶，说已经第二次了，非要报人事扣绩效不可。后来给不知道谁打了个电话，就当着

小利的面问，是我们直接报人事部，还是由他们部门报人事部？小利看着那人挺恶心，都是同一个级别的职员，非要装得牛逼哄哄的，一副大权在握的样子，让人作呕。后来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扣绩效的事情也只好作罢。

第三件。业务津贴。这两个月是我们厂的生产旺季，工程师小王一直忙得要死，经常加班到十一、二点，一个星期上7天班都是家常便饭。工厂规定，每个部门都可以根据公司业绩去申请一笔业务津贴，发给本部门员工作为奖励。不过这两个月也许是太忙了，上头的长官也把这事儿给忘记了。有人去找本部门的老板，老板推来推去最后也没个结果。后来项目管理小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把这事捅到上头长官那儿去了，长官们恍然大悟，赶紧批示这个月把业务津贴给小王们算上。月底发了工资条，小强屁颠屁颠跟在小王后头问：“怎么样，有没有这么多？”然后神秘地伸出2根指头。小王点点头，然后拍拍小强的肩膀：“你小子够仗义，好哥们儿！”后来的一段时间小王干活就特别卖力，特别是对这个仗义的项目管理小强，办事都是用小跑的。



进大厂做品质

我是四川人，家境不好，父亲长年生病。毕业以后来深圳，我进了一个台资电子厂，是在厂门直招的。它的产品全部出口，当时有两千多人，后来发展到三四千人，再后来搬迁到惠州，有1万多人了。这个厂自己买的地皮，光是我们做操的操场，都像体育场一样大。进厂后没几天，我被调到品质部门，工资每隔三四个月会涨一点。因为我拼命干活，早来晚走，被评为优秀员工，以后每个月都有额外的奖金。我比较喜欢钻研，在品质部，有些工作不归我管，我也愿意学会。可能因为这个原因，厂里对我比较满意，年底时，管理会私下给一些人礼品，说是公司奖励。有次我得到一个照相机，有人看到问我，我说是公司奖励，别人也没说什么闲话。

我挣1200多的时候，普工只有500~800的工资。他们经常自离，因为工资太低，劳动时间太长。另外，这个厂每天早上要做半小时的操，很多人都反感。做操时各部门的管理要点名，不去做操的会被惩罚去扫地、扫厕所。可能还有一点点罚款。平时如果产量不达标，管理会骂，听别人说过“今天又挨骂了”。不过，我没挨过骂。

我出来打工十年，一直很顺。我那些老乡，有在电子厂、制鞋厂、制衣厂做的，都诉苦说太累。我做品质，不觉得累，像玩一样。但当时劳动时间太长，上半年淡季，加班到十二点；下半年旺季，加班到半夜两三点。早上还要做操，一周只有周日可以休息。我很有精神头，能熬夜。当时厂里包吃住，完全不花钱。可能是因为家里比较穷，我觉得食堂还行，吃得很好了。员工宿舍大概每间10~12个人，我只住了几天，后来被安排到品质部门，就搬到他们的宿舍。在厂里，这个部门待遇最好，是在外面专门租的房子，两个人一间房，早上有包车送去上班。

我比较内向，不大跟同事来往，主管有时招呼我们吃个饭，我都不去。当时，很少看到台湾老板，我也不关心这些，我只想着挣钱。

这个厂不拖欠工资，没有工资条，全部是发现款，而且我也不清楚

工资怎么计算的。当时的想法是：我给你干活，你给我钱，就行了。我每年能汇给家里1万多块，因为我当时一心想着家里父亲有病需要钱，所以不买衣服，不买手机，只用BP机。家里后来装了固定电话，我就在外面公用电话亭打给家里。

这个厂春节会请全厂吃饭，有联欢晚会，吃饭就是加几个菜，还不错。另外有红包，我拿过一两百，不知道其他人拿多少，彼此保密，但一定有差别。我们管理拿了五百，数钱时被我看到。厂里每年有春游，不去的要罚款两百，因为讲究团队意识。春游就是去海边或爬山，有吃有住，吃烤肉。我本来不愿去凑热闹，但怕罚款，就随大流了。

有一次去邮局寄钱，在门口看到大群人围着看什么热闹，我也去看，被偷了一个月的工资。这以后我从不聚堆，有什么事总是躲得远远的。

我在这个厂做了4、5年，后来家里要我回去，大意是年纪到了，要嫁人，不要再出去。我就辞工了。我们厂辞工不好辞，但是品质部就好辞。当时主管跟我说：“别的厂都自离跑到我们厂，因为我们厂待遇好。你回家能做什么？肯定还要出来打工！你要做生意的话，你那点钱哪里够，话也不会讲，也不会跟外人沟通，你回去做什么？”但我还是辞了。

在小厂当管理

回家呆了一两年，试着卖电话卡，不好卖，亏了。06年我又到深圳打工，去人才市场转了一下，发了简历。有一个小厂，30多岁的浙江老板，录用我做管理，其实是什么杂事都做。

老板和老板娘平时不怎么露面，在外面跑。厂长是个20多岁的大学毕业生，主要负责接待客户，懂一点技术。还有一个技术人员。据老板的同乡说，老板原来在一个厂里做技术，这个技术人员是他同事，后来被他挖出来到这个厂。

我们三个跟老板一家住在一起，各有各的套房，套房里有客厅、厨房。厂里包吃住，但是食堂不如台资厂。这家厂比较宽松，没那么多条条框框。每天加两小时，没夜班，只有很少几个人是两班倒。

我的工作是把所有的报表做好，负责物料的接收和发放，也要维持车间的生产秩序。当时全厂只有3台电脑，给老板、老板娘和厂长用。我做报表都是全部手写，每天中午12点以前把前一天的生产情况汇总出来。

我的工资一千二，还有一点奖金，厂长三、四千，技术人员三千多。本来答应我立即发奖金，但是进厂后没给。我去找老板，他说“我的意思其实是半年以后给”。半年以后只给一两百，后来逐渐增加。我辞工的时

候全部收入大概两千。

这个厂是做手机里的贴片，每天要做一百万片以上，厂长说每片能赚两毛。这个老板应该是赚钱了，现在他的厂有几百个工人。他也搬过厂，但还在深圳。老板买一些劣质原料，结果造成经常退货。他的对策是继续买劣质原料，但是要求烂货出良品。老板每次来厂里，就找技术人员谈话，跟他很亲热，拍着肩膀，商量技术改良。那个技术员总是说“我回家想一下！”。有时候，他还真解决了用烂原料做合格产品的一些疑难问题。他现在还在那个厂里做。

厂长大概一两个月请我和技术人员吃顿饭，沟通一下感情，但是从来不问隐私。我们经常开会，也是只谈公务。

我以前只知道拼命干活赚钱，当上管理以后，心思就变了，看到厂长挣三四千，心痒痒的，开始有往上爬的念头。这个厂周日休息，我就去图书馆看管理方面的书。厂长有时给我们说一些事，我也借书来看相关内容。

说起那个台资大厂，要求的虽比这里多，但也是管理走过来，大家就不说话认真做，管理一走，该聊天的聊天，该玩的继续玩。这个小厂有几十个工人，40台机器，厂长说每台机器都有10万块以上，不知真假。工人很老实，有时可能玩一阵，然后拼命干活，不会耽误的。老板那几个浙

江同乡，三十多岁了，最老实负责，什么都不用督促的。我很奇怪，老板为什么不从同乡里提拔管理？

我负责产品良品的统计，如果有货掉在地上、丢掉、遗漏在什么地方，也全算成不良品。报表交给老板娘，她是管钱的，会根据报表罚款，算得很仔细。有的工人自离时跟我说，被罚了几百块，工资都扣完了。这个不良品，我要在报表上隐瞒是不可能的，所以帮不了工人什么忙。工人请假，我从来不批。他们要是私下请假的话，还好说，但他们总是当众请假，装病什么的。所以我一律不批，给他们放假就没人干活了。

可能因为这些，工人跟我关系不太好。我在车间里一走过去，他们本来聊得热火朝天，就都不说话了，只干活。我一走，就传来叽叽喳喳的声音。我跟他们吵过，因为有几回退货，我被老板屌了，我去说工人。他们跟我拍桌子：“你来做啊！你来做一下也好！”我告过状，结果他们挨了罚款。后来我也不告状了，我跟他们说：



“你们不跟我吵架，我不告状。”他们也有我的把柄：每天下班后，虽然老板说我们几个管理可以不加加班，但还是得去转转看看。我从来不去，躲在一个小房间里看书。就算去了也不会帮工人干活，我从没帮他们干过活。他们知道我晚上看书，我也怕他们告状，所以后来就是互不侵犯。

我把管理重点放在栽培新人上面，因为来来走走很频繁，我就鼓励新人学习老员工，增加产量。生产过程是很容易学的，新老员工很容易打成一片。

老板娘很苛刻，要求工人别把产品掉在地上，经常骂员工。老板就出来扮好人批评她。她有个弟弟也在厂里，但那个家伙总是让我替他干活，自己溜出去打游戏。老板娘一见弟弟不务正业，就发火，有时姐弟俩在住

处吵成一团。

这个厂从来不批辞工。只有一次，有个女孩文员，她跟我关系还好。我住处有厨房，不怎么做饭，她在宿舍没做饭条件，就到我这里做。后来她说工资太低只有几百块，要辞工，老板不批。老板跟我们在一个办公室，所以有见面机会。我替那个女孩求情，说她家里困难，钱太少，还经常周日义务加班。老板说：“这不是你的事，你别管，让她找我。”我跟老板反复说了几次，老板娘就给她结了工资（老板娘自己有个办公室，躲在里面算钱）。

这个厂我呆到09年左右，自学了法律跟老板打官司要加班费，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大转折。厂里同事凡是知道我打官司的，都说该打，因为他们也想要加班费。

踏出校园开始工作一眨眼就两个月了，感觉时间过得好快，因为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事，同样的生活，日子很是单调，经常就会没有时间的概念。下面就给大家介绍我在工厂的一天：

我们上午是八点钟上班，跟正常上班时间一样，但是我每天早上七点钟就得起来，自己做早点吃，一般都是煮面条。厂里虽然有一个食堂，但是那里的饭菜实在是不敢恭维，又贵又难吃。早上就是细面

条、粗面条、饵丝（云南的一种面食），在水里面煮一下，自己加点调料（油是师傅加的，量就甭提了）就可以吃了，真是不好吃啊。中午和晚上更不用说了，菜的品种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什么花菜、豆腐、玉米、土豆啊，有时加点肉在里面，但是都没什么油，味道可想而知。菜难吃也就算了，饭也一样，干得很，实在难以咽啊。所以厂里面的员工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吃。我在食堂吃了一个星期，就改成自己做饭吃了。这都没办法啊，早上有时想睡下懒觉都不行……

吃完早点，差不多是七点四十，休息一下，就去上班了。从宿舍到车间步行只要几分钟。经过厂门的时候，保安会检查一下你是否戴了工作牌，没戴就不让进，叫你回去拿。来到车间，差不多七点五十了，在休息区坐下，等待同事们到来。八点了，同事们差不多到齐（有些会晚几分钟，但这不属于迟到），然后大家都坐在一起，班组长开始开早班会，包括签到、填安全事故卡、交待当天的任务等。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是在那聊天，因为大家对这些东西都很熟悉了，很快就能搞定。开完早班会，已到八点半，然后大家就开始干活了。

我们厂做的是水电站的闸门，每天就是拼那些门叶、轨道什么的，简单说就是把好多铁板拼成一个整体，从几公斤到几吨不等。干活基本都是

两人一组，小件的话就一人扶着，一人点焊，大件就得用行车，把铁板调到制定的位置，然后再焊起来。焊那些小件的时候，有时要蹲着才能焊到，所以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，等焊完之后，两只脚那个痛啊，都站不起来。

上午是十一点半下班，下班了大家都朝宿舍前面的那块空地走去，那里每天中午都有从厂下面的村子前来卖菜的人。我们每天都在那买菜（要买好一天的），比较方便。买完菜，回到宿舍，就开始做饭。吃完饭差不多是十二点四五十的样子。休息几分钟，然后小睡到一点二十（下午是一点半上班）就去上班。来到车间还是坐在休息区等待同事们到来，不过没早上人多，因为好多都是直接去工作区域，坐个十几二十分钟，就开始上班了。上午的活没干完的下午就接着干，干完了，就干其他事，直到五点半下班。然后就又是做饭、吃饭，吃完饭就不想动了，就想静静地坐在那里发发呆。

由于工厂是在一个村庄上，附近什么娱乐设施都没有，甚至饭馆都没有，想出去改善下伙食，还得坐车去，所以晚上基本上就没事干了。有时会下去打打篮球，要不就是坐在宿舍看看电视，上上网，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。

这就是我在工厂一天的生活，两点一线，单调、枯燥、乏味……



工厂的一天

行者



老翟 86 年的，个头较高，比本省一般人看起来要高些，说话声音轻轻的，总是带点疲惫的语气，表情很单一，总是微微笑着，很淡定的样子，既不显得积极向上，也不显得绝望，也看不出带着愤慨。老翟年纪不大已经有两个儿子了，媳妇儿在老家带小孩。他中专学校毕业后到工厂实习，就一直在这里工作，已经三年多了。

工厂生产一种机器，有 8 条包装线。每条线都有自己的分析修理岗位，老翟是其中一条线的分析修理员，主要工作是针对生产中发现的不良机器进行初步分析维修，修好之后再进入产线流下去，提高生产效率。

产线分为前段、中段、后段。前段将分散的原材料组装成整机，中段进行开机预热和各项常规功能检测，后段进行包装，之后就送到质量部门抽测，通过以后就进入成仓出货了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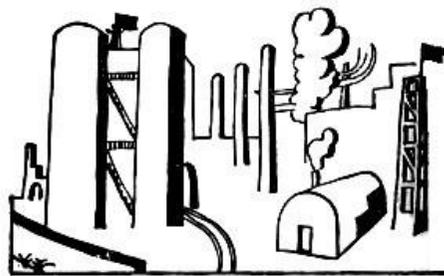
假如通不过，则要整批返回产线处理。分析修理岗主要是针对中段检测出来的问题机器进行修理。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问题机器还是很多的。在量产过程中，问题机器一旦被发现会立即退出流水线，由分析修理岗搬出来修理。

问题机器搬出以后，通常老翟会戴着静电手环，根据产线作业员贴的标签上所写的问题现象，判断是什么故障。如果是软件问题，会请研发部的相关工程师来解决，因为软件问题通常会批量性的。如果是硬件问题，则会按照一定的流程检测，锁定坏掉的部分，然后请工厂的来料检验部门过来确认，更换好的过来，给机器换上。如果确认到某颗电子元件不良，会拿出备用元件换掉。他们的电烙铁用得非常熟练，取掉很小的电子元件，只是一两下的问题，干脆利落，比研发部的很多工程师老练多了。熟能生巧嘛。

通常到了量产阶段的机器出问题都是单体问题，通过交换组件，交换元件，很快可以解决。解决不掉的会报告研发部，由相关的工程师来解决；还是解决不了，就会上报到公司的设计端或者客户端。这些问题通常会比较严重，比如存在设计漏洞，或是批量原材料不良。通常这种情况老板们会参与处理。这涉及到一些潜规则，比如要对客户封锁信息，对供应

商打压，因为这意味着上市产品存在质量隐患，客人可能会索赔，而这钱最好是能够转嫁到供应商头上，不能让本公司出血。这些都是老翟他们左右不了，甚至不会了解的信息，也是他们不关心的问题了。到了各方面问题解决清楚，新的对策导入，生产得以继续。

老翟的手机很高档，3000 多块，三星的，照相机非常清晰，看起来很大气，买了一年左右了。其实他的工作也用得上，经常需要将不良现象和不良元件拍照发送给研发部相关工程师，或者质量检验部门留证确认。工厂很多人都会选择买一部照相功能过得去的手机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产线其实卧虎藏龙，不少刚出来工作的小伙，手里拿着苹果。流水线有时候会因为机器故障，或者某个站位需要的时间较长而卡住，后面站位的事情做完了，他们就会在那里玩手机，这也是唯一能打发无聊时间的方式了。不过，玩手机对于老翟来说，就不现实了，他每天不会有时间闲着的。



这条线主要做数量较少的量产工单，以及研发部试验用机器的工单。人少，机器种类却比别的线好几倍。与争分夺秒比产能的制造部相比，试跑线产量低三分之二以上，但是相对来说问题比别的线要多好几倍。老翟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。这条线是没有夜班的。其它分白夜班的产线分析修理人员通常会换班，而老翟通常要从早晨 8 点上班到要到 11 点，有时候甚至会超过 12 点，第二天还得继续上班。一套工单如果到晚上开始，还剩点尾数，产线希望把它做完，这样第二天就可以做新的工单了。这样做虽然方便了产线和研发部门，可老翟就苦了。他每个月的加班都会超过 180 个小时，这可不是混加班，基本上都是实际的加班，活儿很多。这就意味着，每天平均要实实在在地加班干 6 个小时，才有可能拿到每月 4000 元的工资。加班费比基本工资要高很多，制造部就是靠加班费，大家都知道的。

分析修理岗的位置，是在检测站和加温站之间。加温的机器需要经过电脑控制的传动系统送到检测站，而分析修理岗恰是在传动系统的正下方，非常吵：动力机器的轰鸣声，传动带的摩擦声，液压放气的声音，机器播放的音乐声，人们的说话声，主管的吼叫声，交杂在一起，整个人被噪声包围、笼罩。有时候，老翟会到

研发部去签单，比如为了工时问题，有时也会去找些东西、领些料之类，这时候才会脱离这个嘈杂的环境。

早晨 8 点上班，中午 11 点吃饭，11 点 40 分上班，下午 5 点吃饭，5 点 40 分上班，晚上通常是 11 点下班，周末通常是不休息的，每个月大概会休息一天到两天吧。总之加班时间超长。从表面上看，老翟是希望加班的，因为这样工资会高很多。他似乎不太会抱怨加班时间那么长，但有时候找他帮忙办点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发出“累啊”的感慨。或许可以理解这样的状态，希望超长加班，趁着年轻多挣钱。要知道基本工资是很低的，要想挣更多的钱，就需要多加班。大家都没有自虐的倾向，如果不加班可以拿同样的钱，当然谁都乐意不加班。但既然不加班就完全没有可能拿这么多钱，那么加班就是必须的，如果长期如此，那么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表面上大家都乐意加班，对超长加班顶多抱怨几句。

老翟总是带着疲倦的神态，就是超长的加班造成的。而他坚持下来，与他的家庭和妻儿有关，与他的年轻有关。或许老翟的妻子、儿子不知道他工作得这样辛苦。如果将来他的儿子长大了，知道了他父亲当年的工作，会怎样想，会怎样看待这个世界？

假如他在这个工厂干十年后会

怎样？估计是升不了什么官的，因为旁边的一条大线也有分析修理岗，那位大哥看起来比他大了十岁左右，也依然过着同样的生活，可能会稍微轻松一点，工资也可能会有所增长，但幅度是可想而知的。老翟的工资大部分会剩下来，因为工厂提供食宿，两项费用加起来不会超过 300 块；老翟也没有时间消费，上班需要穿工衣，一个月只有一两天休息，得抓紧时间睡觉，钱自然就省下来了。手机和电动车算是比较大笔的消费了。前段时间他的电动车被偷，他抱怨说，气死了，新买的，两千多块骑了几个月被人偷了。他很无奈，但也没有报警，因为报了也没有用。

老翟就是这样，带着疲倦，带着不紧不慢的语气，带着微微的笑容，带着对家人的责任，在那嘈杂的环境中，度过一天又一天，这样持续了三年多，而这种生活，还将继续下去……



《五一节》密德罗辛 作



我们主管四十来岁，据说在这里做了十多年了。平常都穿着办公室职员统一的蓝色衬衣，身材微胖，比较匀称，皮肤白，一看就是做管理的那种。我去上班的第一天，他就带着我在走廊上转了一圈，介绍部门的基本情况。

我们部门人员一千多人，其中产线员工九百多，办公室职员一百多。产线分前段组装和后段包装。不过这里的包装不像一般工厂的包装，把成品装进包装或包装盒就行了——还有若干的检测环节，包括产品的外观、画面检测，标签转换（把厂内标签转换为出厂标签），打包等环节。而且如果产量高的话，往往产品会在包装段留很久，因为种种问题不能出货。我的工作就是要管理工单，保证每一个工单都能完成，以便老板看到的数字比较完满。

主管在给我介绍的时候，时不时

冒出一个洋文来，比如说，“我们这几个月产能很高，loading 很重……”

“来料在这里 unpacking，再运到产线……”刚开始都有点不习惯，还暗暗想，这个主管挺有文化……后来又一次，他在给我演示说报表应该怎么做：“要加上 owner，把责任落实到人头；还要规定一个 due date……对了，due 怎么写，是 D-U-T-Y 吗？”……

后来在谈工资时，我嫌定的级别太低了，人家跟我同一天进来的一个刚毕业的学生都跟我一样的工资，好歹我工作几年了吧。他解释说“我们定的这个岗位本来就是 2~3 级的，因为 loading 并不高，也就是这几个月可能比较忙，等工作理顺了，还不需要这个职位都是个问题”（够直白）。然后又说，我都工作十几年了，现在也才 5 级，我们整个部门才一个 4 级（你满足吧！）。“我在国外的時候”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，也是他吹牛开始的标志词。他之前去国外支援过生产，做的还正是我现在这个职位：“工单管理”。他经常和我说：“我在国外的時候，半年时间，把工单关结率从百分之三十多，提高到百分之九十多。那里的 loading 重啊，外国人又爱做假，不容易呵……”他知道我对工资不满意，后来又有几次跟我做思想工作：“我在国外的時候，工资比这里高几倍，可我为什么还是要回来？”说到这里，他喝了口水，停顿了

一下，看我听得很认真，便接着说：“因为这里能做事。……发展的空间肯定是有，看你怎么去创造”。

我们厂是大厂，做管理都很体面很轻松，平常开开会，看看邮件，回回邮件就好了。一两天下一次车间。最近因为产量高，管理们每天上午都要在一起开“战情会议”，一开就是一个上午。我大概统计了一下，他每天开会的时间大约6-7个小时。回来后就对着电脑工作。无非就是回回邮件，打电话都很少。他在邮件的末尾，经常加上一句话：“只要努力，就一定有好结果。”旁边那位努力扫地的清洁阿姨要是看见那句话，大概会想：“我再努力干，也不过两千多一点！”

我的工作其实很少，也不忙，无非就是做做报表，跟车间、物料和采购部门沟通，保证工单投满，然后能关结就行了。不过这个厂非常重视数字，换着花样做各种报表。他把他在国外用的那个表格也拿来，让我照着做。说这个表格可以反映每条线的生产情况，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，并及时进行改善。“把这个表弄出来，受益无穷！”他强调了很多次。不过我看了好多遍，有点不得要领。他每天下午开会都开到四点多，我去找他，他就说，你加点班做完嘛。听得我头大，又要加班！

他平常对两个大组长（他手下最大的官儿）很不客气，说话都是用教

训的口气。不过最“人性”的一点是，中午吃饭，他总是提前十分钟左右就开始吆喝，叫大家去吃饭。

主管不仅“人性”，而且“理性”。据说多年前他当领班的时候，旁边有几条线因为工资问题发生罢工，他管的产线员工也受到影响，生产无法继续。他立马召集蠢蠢欲动的员工开会，使出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的手段，让他们保持冷静，最终没给工厂造成任何损失。当时他说到：“大家都是出来打工的，挣点钱不容易，要考虑到你的家庭，老婆孩子，不要看到别人在那里捣乱，也跟着起哄。当然啦，他们也不是捣乱，他们的工资是出了点问题，导致这个月拿到的钱都比较少。但是！——”他顿了一下，更加严肃地说道：“那跟我们都没关系，我们的工资又没少，个别人就不要想着去凑热闹了！从现在开始，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。没事做不要紧，都看作业指导书，给我背得滚瓜烂熟！保证这个月绩效奖金不会少你们的！当然，如果有个别人本来就不想干了，也可以私下找我，保证批你辞职。”大家都觉得他说的在理，也不好再跟着闹，就回去上班啦。



这次到了通州后，听朋友说最近几天临时工的工资有所提高，最低七十，最高九十。后来一打听，的确涨价了。涨价的原因听说有两个：一是碰上厂子一年里的第一个旺季——8月和9月（春节的前一两个月又是一个旺季）；二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临时工出了车祸，很多人不敢去做临时工了。但不管怎样，大部分临时工并不乐观，因为临时工的工资起伏不断，往往都是起一次，伏下N次。不过对于临时工朋友来说，能多挣一点是一点……

听朋友说，通过万邦中介去华连印刷厂，一天90元。下午我专门去了一趟万邦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都会在头一天摸一下第二天的活，这样我心里才会有数。到了万邦中介后，才知道边上就是X中介，心里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因为我跟X中介的李某很熟悉（后来发现不好意思的不止我一个）。可惜X中介没有涨钱，而万邦

确实涨钱了。想想还是决定去万邦。

因为没有去过华连，我开始担心自己的眼睛不好使，到了之后能干吗？先前我坚持去X中介干临时工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因为做熟了，组长对我的眼睛比较照顾，而别的中介就不管。好奇怪？头天夜里做了个梦，梦到自己去了华连，可惜的是因为自己的眼睛不好使没能干成，整个夜里都在做这个梦，到了早上梦依然很清晰的出现在脑海里。因为涨了价，我估计去万邦的人会很多，为了能排上号，一大早就出发了。到了万邦没多久，发现果然很多人来排队。中介负责人宣布上交身份证时，一大帮人哗啦一下子涌了上去，争先恐后地交身份证。为什么中介要压身份证呢？一是怕临时工闹事之后就离开了，找不到人。二是怕有些比较脆弱的临时工干了一半后受不了走人。这样的话，中介跟工厂的关系就会动摇。压了身份证后，假如临时工闹事或干不了，就得用钱去赎身份证。

第一天我真幸运，成功地去了华连，也就是说很可能一天能挣90元。当然工资没拿到手是不算数的，一天一万都没有用，因为中介说变就变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我们坐上中等的面包车去华连，车里挤满了人。车里一路上播放音乐，我没心思去听，脑海里一直浮现临时工出车祸的事情。有时候会想：活着那么累，死了也是一

种解脱! ……

到了华连之后,才发现冬天的时候我去过一次,也是跟万邦去的,那个时候听说万邦不是很可靠。这次仔细看了看万邦中介的老板:两个长相差不多很年轻的小伙子。华连印刷厂的一楼全部被万邦中介给包了,有长期工也有临工。此外,万邦跟一个食品厂、一个电子厂有联系,还为周围的厂子保送长期工。因此万邦算是有实力的中介之一。

到了华连之后,我们先被带到了三楼的办公室等候。万邦的其中一个老板简单地训话,让我们好好干,干到半截离开的没有工资,还有就是华连说计产量其实根本不计产量,不过华连比较人性化,要是真做到产量,早点干完早点离开!中介老板训完话后,厂里就来领人了。领导一进来就说今天来的临时工太多了,原本只要20人,却来了40来人,意思就是让多余的人回去。还好中介的老板跟华连里的人比较熟悉,最后我们40来人都留了下来,分别被派到一至三楼。三楼的领导来要人时,大家都抢着去。领导很好奇地说道:“今天的人怎么那么积极?”我想原因是三个:一是三楼的活好干;二是听到领导说今天来的人太多,所以都着急确定自己的岗位。三是:工资涨了!

我跟几个朋友分到了一楼,可能是因为最底层,整个车间一点都不

透气,闷得要死。在华连干了一天,就干两种活,一是拆叶子(把粘在一起的书叶分开),另一个是装书。开始的两个小时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内有一股劲,一股怨劲,一股想麻痹自己的劲。这股劲过后,就全身发软。这样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!跟胜通比起来,华连不管是工作还是制度都比较宽松(尤其是在吃饭方面),我去的其它厂子也比胜通宽松,当时我最大的感受:为什么有些厂子只能是小厂子?而胜通为什么被称作大厂子?原因就在制度,也就是说规矩。制度严,就像个大厂的样子。

下午在装书的时候,遇到几位从万邦进华连的长期工,都是年轻的小姑娘。一位小姑娘说自己刚开始干的时候累得腿都断了,这样时候要是有人惹她,她都会跟人打架,可半个月后就习惯了。还有一位十五六岁的小爆炸头——小姑娘做了个流行的爆炸头型,所以台上的人给这个小姑娘起了个小爆炸头的名字,小姑娘说自己就是嘴上功夫比较厉害,其它的都挺好的。这个小姑娘干活很麻利,性格特别活跃。整个一楼有四个台面负责装书,所有的人都很安静,只有小爆炸头一直说个没完,一刻都没办法安静下来。不过小爆炸头已经准备辞职了,好像要学电脑去!几位小姑娘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逛街买东西的事情!

第二天原本打算继续去华连,因为头天的确发了90元,可惜没去成。人太多了,没能挤上!在交身份证时,中介的老板上衣兜里都塞满了身份

证,这种情况下,压根没指望。奇怪的是,头天晚上我做梦自己去成了,可结果没去成,看来梦和现实岂只有着“距离”,简直就是相反的!



· 山东二妮

张就容易出错,搞得领导对我没什么好感。其实我觉得员工和领导之间还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好!

- 俩班长: 一个班长经常来车间溜达,视察员工干活;另一个班长没什么大事基本上不来车间。一工友说班长来不来,干活的结果都是一样的,大伙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!
- 一位工友的工资单: 基本工资加上这补贴几百块钱,那补贴几百块钱,外加其它补贴几百块钱,最后再加上加班费几百块钱,看起来好多,可总体工资还不到2100元,唉!
- 一位工友说打工根本没有前途,那做什么有前途呢?答案只有三个字——不知道!
- 流水线上已流走我多少青春和热汗呐!
- 每件消费品的出现,就意味着一个血汗故事被隐藏……
- 一位大姐通过保洁公司进了L食品厂做保洁工,一个月1800元。可保洁公司每个月都要扣中介费500元,大姐只能拿1300元。大姐挺郁闷的。保洁公司也太黑了,每个月
- 现在的工厂领导真的很聪明: 员工要求八小时工作日、双休日,工厂就满足员工。可没有拼死拼活的加班,就没有多一些的工资。因此表面上看老板没有强迫员工加班加点干活,可实际上是用钱来逼迫员工自愿加班,这招够狠……
- 今天下午,班长在我干活的对面坐了老大一会。当时我紧张得全身都是汗。也许有朋友会说:“至于吗?”可我这个好人好像跟领导(不管是大领导还是小领导)没多少缘分,因为我看到领导就紧张,一紧

都扣。其实这年头不黑怎么挣钱呢？后来大姐辞去了保洁的工作，通过劳务又进了L厂流水线，劳务比中介的好处在哪？我不知道……

- 有些劳务公司挺好的，对找工作的人有着一一条龙服务——找工作，包进厂，车接车送进厂面试，去医院体检，甚至帮忙拿体检结果等。这一条龙的背后是什么？俩字——利益，劳务公司和我们打工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利益。其实工厂、公司也一样，一旦利益没了就什么都没了！
- 黑中介依然存在，可让我最想不明白的是：现在找工作为什么非要经过劳务派遣呢？经过劳务这么一派遣，我们就跟劳务签合同，那么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？劳务工？可我们并没有给劳务公司打工。工厂工人？根本算不上，虽然你在工厂打工，可你没跟工厂签合同，工厂只能承认你是劳务工而不是工人？啥世道……
- 一位朋友说：小时候的一毛钱都是钱，现在的一百块钱都不是钱了，真不知道自己每天累死累活的在忙什么？是呀！这年头最不值钱的就是钱了，但大家还得拼死拼活了为了钱而活着。为钱而活着听起来很俗很没有觉悟吧，可生活就是这么俗，就得靠俗养活着，觉悟再高也得向俗低头……

- 虽然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了，但还是要存些钱的，因为老百姓的日子就是这样：饿不死，但绝对也撑不饱……
- 这几年来不得不承认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的幸福率降低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需要的不是富裕的生活，而是幸福的生活！
- 听说L食品厂去年大罢工，原因是新来的韩国经理不仅控制加班（工人主要是靠加班挣钱）还不给涨基本工资。经过员工罢工，经理也不控制加班了，基本工资涨了百分之四十，变成了今天的1160元（北京的基本工资）。能说员工“闹事”吗？他们只是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！
- 这周的周六周日都不加班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有人欢喜有人忧。因为不加班对于一些工友来说，没办法挣加班费（工厂主要靠加班费挣钱）；对于特别想休息的人来说，加班没办法休息。不知道其他工友是属于哪种？我属于想挣加班费的流水线员工！
- 我下半年的目标是挣钱、挣钱、再挣钱，因为2012年父母要从新疆回老家，许多地方都会用钱，没办法呀！表面上看大多数人都是拜金主义，其实大家对钱厌恶到了极点，因为钱是个杀人不见血的刀……

我做拉长那些年



阿平讲述 向日葵整理

我94年进到××电子厂。当时这个厂在当地很有名气，工资高，福利好，很多人都想进去工作。我虽然是高中毕业，当时来讲学历已经算是很高的了，但是想做文员一类也很困难。那会就有一些大学生，因为专业不好，再加上是农村出来的，在城市里也没有门路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进厂做普工的情况。这个厂里平时招人不多，我在厂外等了半年多才等到它招普工，而且还要像选美一样经过考试、挑拣，才能进厂。

厂里有从员工里选拔管理的制度，但是管理的名额毕竟有限，很多人做了好多年还只是个拉长，想往上升职很困难。所以车间里明争暗斗的事情不少。曾经有一个人想做管理却总是没机会升职，有一天发疯了，自己戴着厂牌跑去省政府附近转悠，嘴里念叨着我是××厂拉长一类的昏话。后来派出所打电话到厂里派人去

才把她接回来。

有些老资格拉长一类的管理，知道自己拉上有学历高的员工，都会想办法挤走，省得以后爬到自己头上去。那会邻拉上有一个学语言学的大学生，我们车间主任了解情况后，本来有意思提拔她做文员一类，但是这个想法还没落实，那条拉的拉长就想办法逼那个女孩子辞工走了。我那个拉长是中专生，她知道我是高中生，也给我小鞋穿。本来不该我去扫地的，偏偏安排我。我忍着，也没有跟她吵。我想，自己好歹也有些文化，不能一直做普工，好好做总有出头的一天吧。

进厂没几个月，因为订单多，需要开新拉，厂里放出消息说要从员工里选拔管理。我知道后就去报名。考试题目很多，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、语文都有。因为我以前文化课学得扎实，所以这些考试并不怕。但是因为厂里选管理也要看身材长相，我对面试很没信心。有人说让我去给领导送条烟什么的，我想了想，最后还是没去。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，我凭能力升上去，不愿意厚着脸皮去讨好那些领导。后来还好，我们那个车间主任很看重我的能力，让我进入拉长的试用期。

拉长试用期过得很紧张，就两个月，会在各方面都进行考核，行就要，不行就让你走人了。那些主任、部长的，平时也会时不时问个问题，看看

你能不能答得上来。我一直表现不错，最后顺利地过了试用期。

可是做了拉长也不轻松。我开始几年做得很认真，也很辛苦。上面有什么要求下来都是严格执行，催着赶着下面的员工去做。有些员工都嫌我管得太严了。跟其他拉长之间的关系也很麻烦，互相斗，你不服我，我不服你。厂里搞生产竞赛，每个月都定产量指标，评优秀。我们为了那一点奖金，就使劲做拼命赶，互相比赛，看谁做得多。它那个指标就不断地往上升，最后把大家都累得不行。

可能和生产压力太大有关系，我们厂疯过几个员工，还有自杀的。第一个自杀的是因为自己未婚先孕，又被男朋友甩了，没心情做事又被拉长骂，想不开就从宿舍楼顶跳下来。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么开放，到处都是人流广告，随便就能做了。当时一大清早，楼下的清洁工正在打扫卫生，突然跟前就重重地摔下一个人来，咚的一声，死在眼前。那个清洁工也吓傻了，好几天没来上班。厂里因为这个事特地停产一天，请了一个道士来做法，要驱走厂里的邪气。可是后来这种发疯、跳楼的事情没见少，却是越来越多。

厂里虽然搞这些考试、选拔一类的，看起来挺公正。但是很多事情还是有关系就能混得好。有一次评优，我辛辛苦苦地做事，明明最后的成绩

比别人都好，结果那个和厂长有关系的人奖金比我高了一倍。我当时气不过就去找了车间主任。我脾气直，说话也不会拐弯抹角，当时就跟他拍桌子问：凭什么给我这么点奖金？我有哪一点做的不如那人好？主任也说不出话来。我这么闹过以后总算把奖金加上去。但是我也觉得心灰意冷了，再也不像原来那样认真做事，能做得及格就行。

这个厂车间里粉尘很大，做了很多年的人好多都得了病，而且往往越是认真、不会偷懒的人病得越重。做了这么多年，钱没挣到多少，却落下一身病，厂里对待我们这些老员工不是骗就是拖，根本没一点诚意想补偿我们。想想这些年受的这些累，遭的这些罪，真是气啊！后来我们很多人和厂里打官司要赔偿，因为我学历高些，又做过管理，敢跟厂里讲话，大家就选我做代表。

之前我做管理都是按照厂里的要求，催着工人干活，有些工人还嫌我管得严，但是现在却是带着工人和厂里对着干。有人奇怪我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其实我就是无论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情。之前做管理是站在厂里的角度说话，现在我和其他工人一样，要赔偿，要健康，就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做事。



来自广西乡下的小莲大姐是个快 50 岁的“老工人”了……

出来打工之前，我一直在家种地。家里有三个孩子，要上学读书，负担非常重，后来就出来打工。

九几年我出来打工，先是在老家的城市防城港的一家 100 多人的塑胶厂上班。老板是广东梅州的，经常让工人加通宵。我们每个月上 30 天，每天上 10 多个小时的班，特别的累，却没有加班费，一个月下来只有 650 元。

有一次，工厂没事做，老板只发了 500 元，我觉得工资太低，就没有签字，去找老板理论，老板还算“好说”，补回了差额。但那些签了字的

工人就没有补回来。

直到 2005 年，我才来深圳，进了现在这家厂，也是塑胶厂。我不会看图纸，每天只管开机器，手套弄得很脏，全是机器油。虽然车间安了排风扇，但没多大作用。车间里一层楼有 8 个摄像头，就差没在厕所里装摄像头了。

这个厂老板太抠门了，每个月都扣员工的工资，而且拖着不发。没办法，我就打 12345 向市长投诉，同时告诉接线员要替我保密。结果工资很快发下来。只有线上的工人知道是我打的电话。有一次，工厂拿双休日调休，我要双倍工资，去找行政主管理论，最后还是补了。

我们原来的经理还不错，因为老板也拖他的工资（他的工资有 5000 元左右），他就带头停工，停了 1 到 2 个小时，工厂就发工资了。

我们现在的经理，人一点也不好，喜欢骂人。他骂人特别难听，说傻逼。我就回应你的孩子家人都是傻逼。他就哑了，没有话说啊。他让我辞工，我就不辞，看他怎么办。

我比较喜欢上夜班，没有太多的老大来管，比较自由，不过也很累。白班老大太多，比较严。

我的工资一个月下来两三千左右，伙食补助 300，工龄补助 100。工厂老拖工资，不过我最担心的是没事做，所以想做临工，多赚点钱啊。

小芳讲述
向日葵整理



我们厂是做品牌内衣的。老板是本地人，说是在当地很有势力。老板的女儿嫁给了政府的一个什么官做老婆，结婚时在厂里摆酒席。拉长以上的管理都请去了，听说场面非常热闹。不过，幸好没有叫我们员工去，那些拉长每人交了约 200 块的红包呢！她们自己都觉得亏，花那么多钱凑这个热闹可真不值，可又不敢不去。

老板娘很强调企业文化。厂里有很多活动，几乎都是她安排的。我们每天早上上班前要唱厂歌。我刚进厂的时候，不知道歌词，听大家有气无力地唱“加伊玛，加伊玛……你是朝阳……你是我们的希望……”，什么调都有，笑死我了。我不喜欢这个歌词，把厂里吹的那么好，实际上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嘛。但拉长盯着唱，也不能不唱，开始跟着瞎唱，后来干脆光张嘴不出声。唱完歌管理训话，总

是那老一套。拉长在上面说着，我们在下面偷玩手机，低头打瞌睡，玩手指头，做什么的都有。

上班的时候，办公室的文员高兴了会放些歌，给大家提神。如果有人过生日，还可以点歌。点歌的人可以自己到广播室讲祝福的话，也可以写在纸上让文员念。这个是大家很乐意做的，很好玩的，拉长都支持。最热闹的还是春节联欢会，会前一个月厂里就开始张罗，员工可以自己报名参加，厂里还会请来当地的舞狮队助兴。

那年春节联欢会，老板和老板娘轮流上台致辞。矮矮胖胖的老板穿了一身西装，站在台上嗡嗡地说了一堆年度总结，什么产量啊，效益啊，发展啊。我们听的好烦，但一看到他那滚圆的肚子，就想笑，可他总是那么严肃，我们又不敢笑。

老板娘接着老板上台讲话。她也是又矮又胖，穿了一件桔红色的大衣，厚厚的毛领挡住了她本来就很短的脖子，下摆很长，只露出一小截腿，头上歪戴着一顶黑色的宽沿帽。远看去就像一个鲜艳的大水桶，扣了一个黑盖子。我们看到她这幅打扮，笑成一片。老板娘也不恼，冲我们呵呵笑，看起来很和



蔼。开场白照例是那句：“亲爱的加人们！”这个称呼据说是老板娘发明的，因为我们厂名叫加伊玛，为了显得亲切，就叫员工“加（家）人”，意思是一家人。

每年厂里会组织旅游，当天去当天回，虽然不会去太远的地方，但也挺累。有的人要是不去，会被批评没有团队精神。

厂里活动不少，但要是哪个普通员工要想从中得到实际的好处可就很难了。比如每年举办的选美大赛，获奖的人可以作为厂里的形象大使。不过，车间里很少有人中选，选上去的人总是那些办公室里的文员们。因为年年都是如此，车间里也很少有人报名。听老员工们说，比起这个更不公平的是每年春节联欢会时的抽奖，这么多年了，车间里就连拉长都很少人中奖，中奖的全是那些行政部的领导们，文员也很难中奖。



♂ 王晓林 ♂



虽然老板娘想了各种招数，活跃气氛，想留住员工的心，要我们觉得和他们是“一家人”，可厂里的员工还是该走就走，招工越来越难。原因很简单，工资太低了，加班又晚。

我们厂大多数人是计件工资，加班的时候一个钟约有 1~2 块的加班费，赶货的时候经常要加到晚上 11 点多。虽说熟手的工资在 2010 年那会也能拿到 3000 多块，但新手工资往往是熟手的一半不到，一般要做上 2、3 年才能达到熟手的速度，很多人熬不住就走了。就说那些老员工，有的在这个厂做久了也想换一个小厂。他们是这么想的，在这个厂，每天都要唱歌训话，还要打扫卫生，这些都不给钱的；小厂不用耽误这些时间，可以多车几件货。又因为是品牌内衣，要保证质量，车货时就会慢得多；小厂虽然单价低，但是可以车得快些，算下来比这里挣得多。

大家还是更看重实际的东西啊！

9 月底，S 市的清晨已经能感到初秋的凉意了。一栋 5 层楼的厂房顶上，十几名员工或站或坐，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还有几个员工坐在楼顶的边缘，腿悬在空中，下面是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大福家具厂。这不是一场寻常的“跳楼秀”。实际上，他们在头天晚上就被赶上了楼顶。

这要从1个月前说起。这批员工都是大福家具厂的保安。虽然他们只是保安，但一直被工厂当作万金油：除了日常执勤外，还要高空清洗工厂大楼的玻璃，偶尔兼职园艺工——给工厂除草。而在8小时工作日之外，他们每天还必须有8小时在工厂“备用”，随时听候工作安排。这8小时的备用班没有任何工资，只偶尔发给不清不白的10元“补助”意思一下。保安们在8月底开始以各种形式向厂方提出意见，要求停止高空作业、取消备用班和支付高温津贴。部分保安，尤其是几名主要代表，已经在厂里工作了十来年，他们决定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，要求厂方出面谈判，但是厂方并没有理会他们。如此拖了两个多星期，保安终于决定来一点“硬”的，写了两份传单，其中一份写明了保安的工作状况和诉求；另一份更像是呼吁书，列举了一些对员工很不公平的地方：工资明升实降、没有高温津贴、工作待遇差等。传单上书：“今天支持我们，就是支持你们自己！”“我们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”等。厂方担心保安的行为给员工造成“不良影响”，这才同意谈判，但谈判时不仅没有答应任何要求，还威胁他们“未经公司同意，私自张贴、散发带有煽动或蛊惑之文件”违反了厂规厂纪，接着发出通告，对一部分员工采取“记过”处分。保安一看更生气了，

决定罢工。不过罢工期间，为了不跟资方“彻底闹僵”，他们决定白天罢工，晚上还继续值班。又僵持了十来天，资方索性一纸通告解雇所有保安，并要求他们当天下午4点前离开宿舍。到了晚上，保安们并没有离开。厂方叫来当地防暴队，把他们赶出宿舍。此时已是半夜，很多人都没地方可住。在争执中，两名主要代表被抓，其他人被逼爬上了楼顶。他们用报纸垫在楼顶睡了一夜，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始的一幕。

保安们被逼无奈上了楼顶，期望用这最后一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。可是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多回味一下：为什么保安们在罢工期间，晚上还要回去上班？后来他们说，一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这家厂做了许多年，“多少还是有点感情”；二是保安们一开始就想着跟公司“好好谈”，不愿意一下子撕破脸皮。可到最后，还是被迫采取了比较激烈的形式。这跟他们一开始的想法是背道而驰的。

为什么“我把工厂当我家，工厂把我当傻瓜”？为什么保安的“良好愿望”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？为什么老板不愿意好好谈？

在日常劳资冲突中，工人可损失的不多。在找工作不难的形势下，连开除这一招往往都吓不倒工人。事实上这些保安从一开始罢工，就已经抱着“即便离职也要争到赔偿”的决心，

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。问题是，用什么手段，做到什么样的地步，才能使老板让步？这就必须让老板看到：不让步就很可能惹来麻烦，或招致损失。众所周知，在生产旺季，往往一发生罢工，老板很快就会答应工人的要求。保安不直接创造价值（不生产产品），他们的作用，就是帮助老板保卫财产和维护工厂秩序。假如他们彻底不履行职务，也会触到老板的痛处。但他们白天罢工，晚上继续为老板保卫财产，这种时断时续的罢工，不仅不能让资方感到任何压力，而且让老板一眼看出他们的决心不足。这就决定了老板不会让步。

在斗争中，保安老想着给资方留些“脸面”，避免给资方压力，可惜这毫无用处。

保安对工厂、对自己付出了十几年血汗的工作有感情，这很正常，“老工人”同样可能有。一个老实本份的打工者变成抗争者，总要面对和克服层层的心理障碍，才能意识到自己跟老板是两路人，利益根本对立。保安们所采取的非常失败的半吊子策略——时断时续的罢工，跟他们还不能跨过这些障碍有关。

可是对老板来讲，只有不讲条件的员工，才是好员工。这并不是说老板这种生物没有良心，而是说，老板的良心服从于他自己的利益。老板也不希望起冲突，但条件是，工人拿着

微薄工资任劳任怨。假如工人跟他讨价还价，提要求，甚至采取某些对抗行动的时候，对老板来说，工人就已经是“不忠”、“没良心”的了，已经“撕破脸皮”，差不多要列入“刁民”的黑名单了；在对付工人的时候，也不需要顾及什么“脸面”。曾经有一个工友受了工伤住院，他那位非常有良心的老板，让老板娘亲自煲汤送过去，还把自己没穿破的名牌裤子送给工友。后来工友出院了，向老板要赔偿，老板立即变了脸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！亏我对你这么好，专门煲汤给你送到医院，还送名牌衣服给你！”工友一时语塞。

在具体利益上，老板和工人总是南辕北辙的：工人希望得到合情合理的待遇，老板则希望待遇越低越好。冲突一旦开启，没有足够压力、不影响到老板的利益，工人就没有任何筹码来让老板“好好谈”，从而做出让步。这也是为什么最初两个多月里保安们诚心诚意要求谈判，厂方则根本不理，甚至还威胁他们“违反厂规、立即开除”。

保安上楼后，惊动了很多相关部门，还有媒体过来采访。这最终促成了事情的解决，厂方终于考虑到自己的“脸面”，放下身段跟保安们谈判，答应了一部分要求。保安们也因为连日来的劳累和灰心，同意了厂方给的折扣，结束了罢工。



老板的心

木萧萧

恨不得一小时有 100 分钟
一天 100 小时
每个月有 100 天

恨不得把节假日
统统拉到墙角
枪毙

恨不得一个人当两人用
两个人当六人用
每个工人当超人用

恨不得女人当男人用
男人当牲口用

……喂，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牲口！

A 厂管理太苛刻
天天加班不放假

传说 B 厂口碑好
赶紧辞工往那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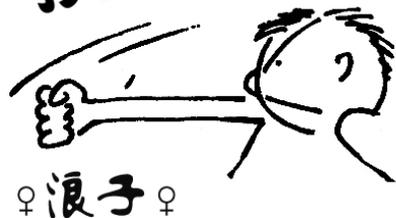
哪知环境太差劲
时时担心职业病

这次换到 C 厂做
管理、环境还不错

就是产量吓死人
干到手酸腿又疼

到底该留还是走
纠结纠结真纠结

换厂心情



♀浪子♀



1. 六十年代韩国的大环境

20 世纪 30 年代，是资本主义“金融风暴”、工业危机与国际战争的年代，萧条、失业和劳资冲突四处蔓延。1941 年，为了走出危机，美国与日本大打出手，以便重新划分亚洲的市场、资源以及商业运输线。1945 年，日本战败投降，它的朝鲜半岛殖民地获得独立。在半岛的南部，建立了美国一手扶持的韩国。

在殖民地时代，韩国工人可谓“干的比牛还多，吃的比猪还差”，积累了大量的阶级矛盾。迫于日本统治者的刺刀威慑，韩国工人长期忍气吞声。韩国独立初期，统治秩序一度松垮，工人抓住这个机会，纷纷罢工、游行，甚至占领工厂，要求改善待遇并成立工会。从 1945 年 8 月至 1947 年 3 月，韩国发生了 2388 次工人示威，参加者达 60 万人之多，一时风起云涌。四十年代末期，在美国顾问的指导下，李承晚总统为首的韩

国政府左右开弓连杀带抓，暂时粉碎了工人的反抗。

整个五十年代，韩国一片昏天黑地。上层吃肉撑得要吐，群众连汤都没得喝。中央政府各部门的高官直接开公司当老板，与他们有交情的一批私企把持了银行、电气、日用品等行业。

1945-1959 年间，美国先后给了韩国二十多亿美元的援助，但大多被台上的权贵贪污了。与殖民地时代相比，韩国工业产量缩减了一半，1957 年只生产了一万六千吨钢，基础设施建设缓慢，电力严重短缺，就连水泥的销路都不好！多年后，韩国官方也承认五十年代实在是一场糊涂：“中小企业（产业）、出口产业萎缩，供给严重不足，物价飞涨”（朴正熙）。在城市，打工者挣扎求生。1956 年，政府公布的失业人数是 113 万人（总人口两千万人），而女工、童工和临时工工资只有男性正式工的一半。五十年代中期，国家修改劳动法，正式取消了罢工权。不过，当局还是无法彻底禁绝罢工。以 1957 年为例，全国至少发生了 118 起罢工，集中于煤矿、铁路以及电力部门，基本要求是加薪或缩短工时。在多地人少的农村，日子更不好过。粮价低化肥贵，种地不赚钱，加在农民头上的捐税繁多，殖民地时代保留下来的地主阶层普遍经营高利贷，榨干了农民最后一点积

蓄。结果，农村人口纷纷涌向城市。

五十年代韩国的一个特点，是教育领域的复兴。1960年的在校生总数比1945年多两倍，小学入学率接近100%。但与此相伴的，是大、中学生“毕业即失业”的老大难现象。

执政十五年后，李承晚集团处境不妙，几乎把人得罪光了：不能安定政局，浪费宝贵的无偿援助，让美国靠山失望；不能提供广泛就业，让工人、学生失望；无力振兴经济，让国内资产阶级失望；中央小圈子紧抓权柄不放手，不给底下人晋升机会，让中下层军政官僚失望。旧的权力格局，走到了尽头。

1960年1月，总统换届选举的舞弊行径激起了学潮，最终引爆了全国性的反政府抗议，美国在幕后指示韩国军方袖手旁观，把李承晚逼下了台。经过了一年的动荡后，1961年4月朴正熙将军发动政变，军政府的时代降临了。对美国大资产阶级来说，它需要一个得力的打手，帮忙维护对美有利的亚洲秩序。其次，它需要一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强样板，向韩国及世界劳苦大众证明无需从事工人革命，也能过上吃穿不愁的好日子。于是，美国一手导演、朴正熙登台执行的“维新”开始了。

为了收拾人心，也为了打击政敌，朴政权痛斥“官员道德败坏，非法财富的聚集，使我国成了腐败和不

公平的温床”，出台了若干反腐败措施，清理了某些与昔日高官瓜葛太深的巨商。但所有的雷霆手段，无非是给新贵的发财之路扫平障碍。1970年，韩国上层内斗，揭露出特务部门“中央情报部”长官李厚洛的非法收入达一亿美元以上，这只是朴正熙“维新政策”下官商勾结的黑幕一角。

同时，朴政权高举“发展才是硬道理！”的旗帜，全力引入外资。1959-1977年间，韩国吸收了美日为主的70多亿美元投资，建起了纺织、钢铁、造船、电子、汽车等产业，大量上马铁路、高速公路、港口和电站。1964年，韩国启动“出口第一”战略，用补贴和减税政策鼓励开辟海外市场。1970年韩国全年出口额超过一亿美元，比十年前增加十倍。1971年，政府开辟了“出口加工自由区”，专门立法规定区内不许成立工会和举行罢工。1976年，韩国出口额达到81亿美元，多数是工业制成品，一个急速强盛的地区性大国，显露了雏形。

韩国工业初步繁荣的主要成果，化为内外资产阶级的利润。六十年代中期，朴正熙集团用私有化的方式，把一大批国有资产贱价转交到私企手中，进一步强化了民间老板的实力。工厂越多，工人的队伍也就越壮大，1960年全国工人总数200万，1975年达到480万。不过，工人数量的增加，并未立即导致阶级斗争的自

动高涨。在美国教官的训练下，韩国国家机器空前强化。除了六十万正规军、十几万警察，还编织了一张由三万“中央情报部”特工与三十万线人组成的全国特务网，对这片九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国土进行无所不包的监控，到处都有窥视的“眼睛”和偷听的“耳朵”。在六十年代的韩国，虽然大学校园有些不稳，数百万工人却是死水一潭……

2. 全泰一的少年时光

1948年8月26日，本文的主人公全泰一出生于韩国大邱市的一个缝纫工家庭，是家里的长子。他的父亲老全是当地某纺织厂的缝纫工，在独立初期的工人运动中，老全（那时还是小全）一度卷了进去，参与了要求加薪的厂内罢工。纺织厂的老板不愿让步，雇来新工人顶替罢工者。老全和工友们堵住厂门，不让新招来的工人进厂，或者把溜进厂的新人“押送出境”。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。政府与资方串通一气，这边老板威胁关厂，“谁不想干就卷铺盖”，那边警察把带头罢工的几个人抓进去严加拷问，工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，实在坚持不住，只好复工。经历了这场风暴，老全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，埋头挣钱不问他事。

连着生了几个孩子后，1954年老全从大邱来到首都碰运气。打了几年

零工，老全攒了一点点钱，弄到两台缝纫机，开了一个小缝纫店。不幸，他的生意不顺，有时布料受潮，有时被人拖欠货款。折腾了几年，家里的光景没啥起色。1960年，他似乎时来运转，得到一笔缝制几千套中学校服的大生意，不料交货后，中间商卷款潜逃了，老全亏本亏得眼冒金星。这一闷棍砸下来，全家简直变得一贫如洗。在韩国，一直存在男人酗酒打老婆的恶习，有些男人唯唯诺诺面对老板、上级、恶警或日本殖民官吏的训斥耳光，回到家里喝点小酒，雄赳赳打老婆踢孩子，恢复“男人的自信”。老全也一样，眼瞅着开店失败，他隔三岔五喝个烂醉，骂骂咧咧。

不管老全怎么借酒撒疯，家里的日子还得过下去。泰一的妈妈做点朝鲜小吃，沿街叫卖。当父亲的缝纫店开不下去以后，读小学的泰一和弟弟也退了学，每天卖报，还制作出售粗糙的木头勺子、拖把一类日用品，后来又去街头擦鞋。这样的时光持续了一年，当时他12岁。

1961年，泰一全家搬回大邱，老全又弄到一架缝纫机，振作起来了。泰一给他打下手，学会了一点缝纫活计。1963年，家里条件稍微好转以后，他和两个弟弟上了一年的补习中学。好景不长，家里又交不起学费了，他和弟弟们也彻底离开学校。失意的父亲隐匿他乡，好久没有音讯，母亲去

首都做帮厨，泰一也跑到首都，在火车站当搬运工，还擦鞋、卖报。他的几个弟弟妹妹有的去了孤儿院，有的后来也跟着泰一当搬运工。回想起这段日子，泰一写道：“连虫子都比我们过得好”。那一年，他刚好 16 岁。

3. 和平市场的服装工业区：谁的天堂？谁的地狱？

在 60 年代的韩国首都，有三个批发服装的相邻大市场：和平、东华与统一。市场所在地原本是个大贫民窟。1961 年，政府拆掉了贫民的棚屋，建起一排排多层厂房，供服装工厂与贸易公司入驻。行政当局成立了“和平市场公司”，负责工业区的卫生、安全和税收。服装厂一般位于每栋厂房的二至三楼，一楼专营零售批发。三大市场的生产贸易规模越做越大，全国的服装技术工云集于此。据全泰一的研究，在 1968 年，这三个市场有 800 家工厂（20000 工人），国家的同期数据是 428 家工厂（7600 工人），原因是存在许多未登记的黑厂。在 1970 年，三大市场垄断了全国 70% 的服装生产与批发。每逢重大节假日，各地商人带着现金赶来排队批货。这里是老板们放飞梦想的天堂，如果运气不坏，一两年里，三四台缝纫机的作坊有望变成二三十台机的工厂，有的老板还能买下厂房。

一般来说，每个服装厂都雇有裁

床师傅及助理、车位工及助理、徒工、杂工以及熨烫工组成的生产班子。据全泰一的调查，60 年代末的和平市场有 14000 工人，包括 4 千车位工和助理，还有 4 千徒工。老板的人数在一千左右，管理人员不足三百。裁床师傅多为男性，其他工人则多为女性。每逢旺季，各厂都会贴出“急招徒工”的告示，因为徒工的身价最便宜，用起来也最合手。徒工一般在 12-15 岁之间，工资最低，也最受气，他们做各种活，比如熨烫、剪线头、钉纽扣。需要 8 年左右的时间，徒工才能成为车位工。当时厂里的缝纫机全是日本货，价格昂贵维修不易，生产的服装无论是否出口，价格都压得很低。对老板来说，他主要赚的是“人工钱”，工资少、工时长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。“和平市场公司”一开始就充当了雇主的协调机构，统一规定工业区的工资待遇，避免个别老板为了赶货，给工人稍高的工资，从而破坏整体投资环境。重大节假日来临前的两周到一个月内，工人通常大量加班，但没有加班费。夏季和新年前后则是淡季，工厂关门或只上半天班，工人在空闲时间义务打扫车间，或找个服务员、小贩一类的临时工，等待旺季的到来。

一个典型徒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就以泰一熟悉的徒工“施达”（化名）为例吧。她十三岁，每天坐公交上班，从早八点干到晚上十一点。车



70 年代和平市场里的工厂

间的面积通常是 18 平米，隔成上下两层，每层高度 1.5 米，总共塞了 10 台机和 32 个工人。车间里没阳光、充斥着布料粉尘、油脂味和管理的辱骂，她直不起腰，也不能随意上厕所。再说，厕所和冲凉房都太少了，总是不够用。车间里冬天太冷、夏天太热、照明太差，而货是永远做不完的。午休的时候，她和同伴爬到楼顶，往附近的一所运动场扔石子，这是徒工们一天里的主要娱乐。她工资不高，还要负担家里的开销，所以常常不吃午饭。她两周休一天，但也可能临时加班。她每月要通宵加班两到三天，每次加通宵，老板都给她吃“抗睡药”或打“抗睡针”。每天快下班的时候，她会眼痛、脚肿、目光呆滞。年复一年，她在厂里一干就是八年，21 岁的时候已经手指变形，有时连筷子也拿不起来，并且得了胃病或肺病。虽然“和平市场公司”也会在指定医院为工人安排体检，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走过场的：“X 光机里没有底片，体检后也不给工人诊断报告”（1970 年全泰一的相关调查）。

虽然徒工的生活很糟，但这好歹是一份可以补贴家用的工作。60 年代的韩国，劳力充足，老板有用不完的人手，而国家也

为企业的用工自由提供了一切便利。

1964 年，和平市场多了一个徒工，他叫全泰一。

4. 全泰一的打工生涯：观察与思索

1964 年春，泰一在和平市场附近擦鞋，看到某裁缝店“急招”徒工，他就去了。店主简单问了他几句，要他马上上班。这是泰一的头一份稳定工作，他很兴奋，憧憬着接济父母和弟妹们。不过，虽然每天工作 14 个小时，工资还不够他付房租，所以上下班前后还要继续擦鞋，挣饭钱。由于他是有经验的熟手，很快当上车位工助理，工资翻了一倍，可还是不够付房租。他连续换了几家厂，并与家人重新住在一起，减轻了一点租房的负担。

泰一是个敏感多思的年轻人，工厂劳动的单调节奏并没有让他迅速迟钝。1966 年秋天，他写道：“我们不能不服从裁床师傅，他对我们有着绝对的权威。如果我们对晚上加班表示不满，第二天他就只派给我们很少的活。”派的活少了，工资就少了。

换了几家工厂后，他的见识更广了，发现“除了大型工厂，在几乎所有工厂里，裁床师傅都扮演着工厂管理的角色，掌握着招聘和解雇工人的权力。这也是为什么对工厂主来说，‘裁床师傅是老板的得力干将’的原因”。

泰一了解到，服装厂的每个小组都有一名裁床师傅充当工头（他是小组的“老板”），手下有一名助手和两名徒工。厂里不与小组直接打交道，一切通过工头。工头跟厂里商定小组的工资，而且从来没什么明确标准，即使是旺季，工人工资往往只比淡季高那么一点。与其他工人一样，泰一感到工资太低：“我干得都累趴下了，并没有拿到与自己的辛劳相匹配的工资。这不公平”。

身体劳累、收入微薄，还不是一个工厂工人面对的全部难题。资本主义工厂的大生产把员工变成机器，这让全泰一特别感到压抑。对此，他有一段难得的记录：

“工厂里充满了巨大的金属噪音，以及车位工恼怒的声音。我不能区分出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但自己仍然努力工作。对我来说，工作没有什么意义。我只是按照自己知道的去做它罢了。除了自己正在做的东西，我没有任何的意识。不，甚至是自己正在做的事情，现在也变成了一种机械的、自动的工作而已。实际上，我什么都不是，我成了自己工作的旁观

者。我的身体在做着工作，但这种工作并没有得到谁的指示。我的感觉和噪音告诉我，自己做完了多少英寸的活路，干了多长时间的活。所有的布料都是在裁剪台上被测算、拉长和剪裁的。但是，是谁裁剪了这些布料呢？每当这种念头浮上心头，我都明白，是我在裁剪这些布料了。我不明白的是，为什么要做这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工作？当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问题的答案时，下班回家的时间到了。我洗完脸，换上衣服，和工友们说声再见，之后，就回家了。在家里，我吃过晚饭，和家人聊会天，然后睡觉，一天的时间就这样结束了”。

（1967年3月13日日记）

泰一过着这样的日子，周而复始。日久天长，泰一萌发了当裁床师傅的念头：“这样一来，我就能与工人站在一起，并与工厂主进行公平交易”。当然，对个人而言，裁床师傅也能赚更多的钱。说干就干，泰一向来是个行动的人，他换了厂，成为裁床师傅的助理。经过几个月的见习操作，1967年春，他被所在工厂提升为裁床师傅。生活又转了一个弯，前面是什么？

5. 帮助别人，很难

虽然当上了裁床师傅，泰一的钱包并没变厚多少。他自嘲道：“三年（工厂）的艰辛生活和（之前）十四

年的贫穷，把我变成了一架点钞机”。不过，他毕竟只有19岁，总是很容易就充满希望。当上裁床师傅以后，他很认真地尝试改善徒工的处境，减轻她们的劳动强度，放她们提前下班，更不会拿她们当自己的出气筒。为了加班问题，他与老板发生了几次争执。后来，徒工们回忆说，她们都把泰一当作自己的大哥。

与许多工人一样，泰一很快对离自己最近的基层管理或工头产生反感，对老板就容易保留幻想。在得知自己被提升为裁床师傅后，他高兴地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从明天开始，我将努力工作，来报答我的老板所做的一切”。事后发生的一切证明，那个老板确实是善于玩弄他人的老狐狸，发现泰一工作认真的优点后，就诱导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，把泰一累得死去活来，直至醒悟自己受了那个“伪君子”的骗：他给老板省下的成本，并没有用在改善徒工待遇上。

虽然泰一在车间努力创造一种温和的气氛，但是他改变不了徒工的经济地位和生产环境，只好眼睁睁看着不平之事继续发生。他见到一个徒工喝了抗睡药之后，干了三个通宵，搞得视线模糊，也抬不起胳膊，吓得在车间里痛哭。他见到一个女工忽然吐血，泰一把她送到医院，医生诊断她得了肺结核，然后那个女工被解雇了。他看到许多徒工为了省钱，不吃

午饭，就把坐公交的费用给她们买了一点面包充饥，自己走夜路回家，结果被派出所抓去盘问。当然，就算警察不找他的麻烦，这样蛮干下去，他的体力也撑不了多久。

泰一的母亲察觉他的所作所为后，劝他少管闲事，自己家的烂摊子还忙不过来，哪有余力去管别人？泰一回答道：“看到那些比顺德¹还小的女孩子在烟雾弥漫的环境中，从上午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，不吃任何东西，我就问自己：这是不是人应该过的生活？”

泰一的母亲没法回答儿子的疑问，再说她自己受尽了贫困的折磨。但现实生活很快用自己的方式终结了全泰一“为徒工做主”的幻想。当他又一次让生病的工友提前下班，单独清扫车间时，老板撞见了这一场面，大发雷霆：“师傅要做师傅的工作。你为什么要干预徒工的工作？你这样，是给她们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”。第二天，老板发现泰一又把加班太久的徒工放回家，就当场解雇了他。

泰一很快在别的厂找到了工作，他是熟手裁床师傅，工业区里又到处招人，所以不用太担心饭碗问题。有一天，他偶然发现了《劳动基准法》，便怀着惊喜钻研起来。如今，他想从法律的角度打开一条工人自救的道路。

¹ 顺德是全泰一的妹妹。

6. 《劳动基准法》与成立“傻瓜社”

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各国政府，都擅长一种愚弄大众的老花招：制订“保护工人”的法律，但不执行它。当工人沉默时，国家自然无视老板的违法行为，当工人起来反抗，国家便及时援引“良法”，骗取工人信任。反过来说，假如国家在立法领域对工人过于苛刻，随后又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修改法律，就会自陷被动，可能导致工人更直接地进攻资方及其后台——国家。当国家成为工人的靶子，它就难以伪装中立，把工人斗争限制在一时一地，也就使资产阶级的整体统治变得脆弱。正因如此，国家对待工人很少彻底撕破脸皮，而总是尽量“说好话，办坏事”。

在60年代的韩国，《劳动基准法》就是这么一部颇为“理想”的法律。基准法第42款规定“工人每天工作时间八小时，每周48小时，在工人同意的前提下，可延长到60小时”。第45款规定“雇员每周至少享受一天带薪假日”。还有关于危险工作环境的规定（第43款），有关于为年龄低于18岁的工人提供教育设施的规定（第63款），有医疗保健的规定（第71款），有工伤事故的规定（第8章），有禁止女性和不满18岁的工人上夜班的规定（第56款）。它甚至规定13-16岁工人的工作时间最高不得超过9小时，违反规定的雇主应判刑两年。

当然，这部法律从未被遵守。对工人来说，《劳动基准法》是一堆废纸，自然没人了解它的内容。

泰一发现了这部《劳动基准法》之后，如获至宝，在家无数遍翻阅，出门到处带着它，还首次提出了工人自我组织的主张。如今他每天一下班，就跑到和平市场找人谈话。与裁床师傅金桂南交谈时，泰一说“作为个体，我们是软弱的。一旦联合起来，就能战斗，变得坚强有力。改善工人待遇，不是件简单的事情。但哪怕裁床师傅的一小部分组织起来，就至少能落实《劳动基准法》。要是老板拒绝落实，市场上三万工人可以罢工，那样一来，老板就不能不听取我们的要求了”。

小金听了这番话，既害怕又想试试。他们两个出钱在一家咖啡馆聚会，邀请了十几个裁床师傅。多数与会者正在找工作，所以一个劲地谈论工资、工位、老板和各厂的变化。这次“聚会”可谓闲谈会，与泰一期望的严肃讨论相去甚远。但他可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。随后的一段日子里，他到处找相熟的老员工谈话，推广《劳动基准法》，可惜总是被笑骂一顿，甚至有人说“只有傻瓜才干这种没谱的事”。泰一还出钱邀请某些裁床师傅看电影，企图说服他们参与筹备工人组织的活动。1969年6月，在全泰一几乎生拉硬扯的努力下，“傻瓜社”总算成立了。成立时，泰一解释了社名的含义：“我们的生活像一

架机器，从没有反抗过剥削我们的雇主。……我们必须完全看清自己的处境，这样才不再是傻子”。

在泰一的反复督促下，这次“创始会议”通过了好几条行动目标：落实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周一天的休息日；多联系其他裁床师傅；学习劳动基准法；有物质条件后，租一个带电话的办公室；在和平市场进行劳动条件的调查；寻求赞助，开办“模范工厂”。就“模范工厂”一事，泰一颇有激情地解释说：“老板总是推脱‘世道不好’没赚什么钱，还说如果他们不开厂，我们就没饭吃。工人可以向老板证明：没有老板，工人也能有饭吃；用更人道的方式开厂，也能盈利。只要外界了解和平市场的情况，一定会有慈善家来帮助我们开厂”。

不过，“傻瓜社”的多数人参与聚会只是想跟同行交换打工信息，一旦找到工作，就不掺和这事了，只剩下全泰一还干劲十足地东忙西走。他印了“傻瓜社主席全泰一”的名片，带着名片到处拜访工人，讲解《劳动基准法》。1969年8月，泰一拉上几个“傻瓜社”成员，向和平市场的工人发放了一百份问卷，调查劳动待遇。这事被老板们觉察了，全泰一被列入黑名单，不得进入和平市场。他一时也顾不得今后的生活出路，带着回收的问卷，直奔市政府找“劳工监察员”提交报告。劳工监察员的职责，名义上是监督工厂遵守《劳动基准

法》，如果厂方违法，监察员就责令工厂整改。实际上，监察员通常是所辖地区各位老板的好哥们，好得穿一条裤子。泰一见到的那位监察员，让他放下报告，说了句“我会处理”，就把他赶出来了。小全有些发懵，又去了一趟劳工部，部里的接待人员答应“调查”，自然也毫无悬念地石沉大海了。1969年的冷秋，泰一依靠打临时工维持温饱，反思前一段热火朝天却又无疾而终的行动，他对所处的资产阶级社会有了更深入的思考：

“这是否意味着自己斗争的对象不仅仅包括雇主，还包括劳工监察部、劳工部，甚至是某种更为庞大的东西？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，自己又怎么能够期待《劳动基准法》得到执行呢？要是每个人都反对我的话，我又怎么可能战斗并取得胜利呢？这一罪恶现实的铜墙铁壁，该有多么的厚实？这道铜墙铁壁，该有多长、多远？”

7. “模范工厂”的幻梦

“傻瓜社”的失败，一时间让泰一成了情绪的俘虏。他不再拉人加入“傻瓜社”，也把《劳动基准法》扔到角落去了。不过，即使是逃避，他还是颇显行动者的本色。这次，他试探的方向是“模范工厂”。

作为了解内情的服装工人，泰一深知那帮老板的生存之道：“这些制造商的竞争，以牺牲工人的工资为代价。正是工人和消费者成为他们竞争

的牺牲品。……为了降低成本，他们生产并兜售劣质产品。例如，一件服装的内层会尽可能采用最差质量的材料。这意味着服装外层的保质期能够持续五个月的时间，但内层就只能持续一个月了”。

泰一写道：“1，我必须创办一家企业，缴纳应缴的税收，将工人当成人来对待，为应该上学的工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。我一定要向我们社会的商人尤其是和平市场的工厂主证明：即便是这样，这家企业也是赚钱的。创办这家企业的目的，就是向人们示范，应当如何经营一家企业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了。”

2，首先，由于我必须获得一笔资本，我必须向社会上的许多慈善家求助，让他们理解我的目标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会资助我们的这家模范企业了。我相信：我们的社会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，是如此的吝啬和思想保守”。

他设想的这家企业应拥有三千万韩元的资本，向工人发放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，缩短劳动时间，设置图书室和乒乓球桌，还要安装供热系统。他梦想着把“模范工厂”办成一个教育实验基地，让就业的工人有朝一日独立创业，把工厂的理念传播开去。

当然，这个设想从头到尾都是十足的幻梦，泰一其实也明白它纯属空想。很快，全泰一就被迫从逃避中清醒过来，因为他和他的家人需要生

存。他去工地当了四个月小工，给家里赚点生活费。他的母亲回忆说，在工地时，泰一有时回家，他穿着工作服，瘦得厉害脸色发青，眼睛困得睁不开，还在絮絮叨叨谈论“工人遭受不公”。看着儿子这幅狼狈的模样，她很想笑，又笑不出来。

8. 重返和平市场，成立“三栋会”

1970年9月，泰一返回和平市场，找到了一份裁床师傅的工作。韩国工业处于持续的大繁荣中，不断有新资本家进入市场办厂，泰一这个“捣乱的小人物”被忙得团团转的老板们遗忘了。站稳脚跟后，他找到了金桂南和其他几个工人，成立了“三栋会”（即涵盖三个市场之意），决议再次开展劳工调查、扩大组织乃至发起静坐罢工。泰一频繁拜访市政厅、劳动部，跑到电视台请愿，联系过“东亚”广播公司的“市民之声”节目组。节目组的记者告诉他，必须提供具体数据，才可能上节目。这一要求坚定了“三栋会”成员的劳工调查决心。

在1970年的韩国老板眼里，工人问卷调查也是大逆不道的造反，泰一就曾因此上过黑名单。这一次的问卷包括劳动时间、休息日、加班原因、职业病和体检、工厂是否遵守劳动基准法等一系列问题。秘密调查组织得很好，避开了老板，回收了一百多份问卷。泰一等人通过工友，还搜集了



各厂的其它信息，并征集到上百个签名。1970年10月6日，“三栋会”向劳工部提交了一份请愿书，题为《关于改善和平市场服装产业工人的工作状况的请愿书》。请愿书概述了和平市场的工作环境、工人的工资、加班和职业病问题，声明“我们工人已经下定决心，我们不能再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工作；这样下去，我们的健康将不保。因此，我们这些请愿者强烈呼吁劳工部，要求纠正这种状况”。

9. 媒体报道·谈判·示威

1970年10月7日，奇迹发生了：《京乡新闻》城市版头条以“三栋会”请愿书为基础，刊登了有关和平市场工人状况的长篇文章。泰一和其他几个人在报社买了三百份报纸，赶回市场向工人出售和散发。工人一般是很少买报的，那一次却大不同：不少工人花了高价买报，有一位工人还捐给“三栋会”1000韩元。目击者说，那天晚上市场里像过节一样，工人们成群聚在一起，议论这篇报道，笼罩着工人的长久沉默，一下子打破了。之后的几天，不少工人主动找到“三栋

会”，许诺参与斗争。

10月8日，“三栋会”开会决定向雇主们要求缩短工时、支付加班费、安排体检以及提高一倍徒工工资，“三栋会”还表示要起诉违反工时安排的老板。10月11日，“三栋会”的三位代表（全泰一、李圣珠、金泳木）来到“和平市场公司”办公室，递交了上述要求，还附带要求了一堆较具体的改善要求（安装通风照明）。管理层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们，表示“好的，我们明白”，然后要求工人略微忍耐一下，给雇主一小段时间。全泰一在内的工人代表毫无谈判经验，他们同意稍微等等，抱着“先看看情况吧，或许真能解决”的念头，乖乖离开了。

虽然管理层暂时稳住了“三栋会”，但是全泰一又促成了一批个别讨薪的行动。当时，他本人已被老板找茬炒掉了，没有拿回工资。《京乡新闻》刊登了和平市场的文章后，泰一和“三栋会”一起去厂里要回了工资。其他工友听说后，纷纷到当初自离的工厂去要工资，而且都很顺利，不由得士气大涨。

由于担心“外部势力”插手工人抗议，朴正熙集团决定采取安抚政策。劳工部派来的劳工监察员找到全泰一，恭维他是“青年楷模”，并许诺在劳动节给予“三栋会”的成员一笔奖赏。劳动法务部的一位中层官员，也约见了“三栋会”的代表，劝

诱他们先找工作，把和平市场的劳资矛盾交给政府部门：“我们一周内解决此事”。泰一和其他工人轻信了他，分头进厂了。当“一周解决”的谎言被拆穿后，泰一召集“三栋会”开会，决定10月20日在劳工部门门口举行示威。那位负责与“三栋会”沟通的监察员，闻讯找到他们，请求暂缓示威：“给我时间向上级反映你们的诉求”。泰一同意了。几天后，这次的缓兵之计又露馅以后，监察员请泰一吃饭，直接摊牌：“你有什么个人问题或困难的话，我可以用各种方式帮助你。所以说，你干嘛不忘了劳工运动这事呢？”泰一当场跟他翻脸了。

听取了全泰一的有关汇报后，“三栋会”全体成员决定10月24日在位于和平市场的一家银行门口举行示威，示威标语包括“遵守《劳动基准法》！”“周末我们需要休息！”。泰一等人四处联络工人参与示威，但他还不知道，“中央情报部”已在秘密监视“三栋会”，还派出特务私下接触“三栋会”的成员，请吃请喝，博得了部分人的信任，个别工人甚至邀请这个特务协助搞示威。10月24日，和平市场的全体保安倾巢出动了，“三栋会”成员则在各厂走动，告诉工人“银行门口中午有娱乐活动，一定去看”。中午时分，几百名工人聚集在银行大门附近，有的人是来参与示威，多数人只是好奇而已。这时，

市场保安也开始挥着棍棒驱散人群。

就在工人和保安即将混战一团时刻，“中央情报部”派来刺探“三栋会”的代表终于亮相。眼看局面越搞越大，他被迫出马。首先，他在市场里部署了众多警特密探，并通知所有工厂主关闭厂门。然后，他把泰一等人叫到“和平市场公司”董事会办公室，软硬兼施，大谈“无论什么事情，对国家有利，就是对工人有利”。几位在场的董事则要求“11月7日以前，请克制一下吧！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的！”泰一听了抬腿就走，但有的“三栋会”会员一听资方的软话，就硬不起来了，再次答应“彼此各退一步”。

泰一憋着气回到银行门口，工人早都散了。他问一位工友：“如果他们11月7日不守信的话，怎么办？”那位工友说：“我们就再搞一次示威。”泰一点点头，他说：“我们不再后退了，直到要求得到实现”。

11月7日，资方的“最大努力”还是不见踪影。“三栋会”又碰了一次头。泰一提议11月13日举行一个烧掉《劳动基准法》的仪式，并打出标语“我们不是机器！”“我们不是奴隶！”“让我们每周见一次太阳！”。按照泰一的构想，他将站在一张桌子上，阅读《劳动基准法》的某些条款，然后呼喊“如果不执行，这些条款有什么用呢？这些美妙的条款都是空话，为什么不烧掉呢？”，然后他象

征性地烧掉这本书。其他人则呼喊口号，开始示威。

10. 全泰一之死：“我们不再后退”

1970年11月13日，下午一点，和平市场的老板警告员工“外面有流氓搞事，你们不要出去”，保安也封锁了市场的各条通道，“三栋会”的几位成员被预先扣押在保安办公室。下午一点半，全泰一等人携带的横幅被警察抢走。泰一指示工友们先去示威现场，他稍后再去。当大家来到现场时，他们看到几百个工人围在那里，与保安警察推搡着，而“三栋会”联络过的记者，并无一人到场。

十分钟后，全泰一出现了，他把老相识金桂南拉到一条巷子里，说：“局势好像发展到了这样的一步，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做出牺牲”。然后，他要桂南点火靠近他的衣服，桂南下意识地服从了。全泰一全身冒起了火焰，原来他把一罐汽油浇在了自己身上。他跑到许多工友所在的巷子里，大声呼喊：“遵守《劳动基准法》！”“我们不是机器！”“他们不是机器！”“不许剥削工人！”，之后，他扑倒在地。所有的人都吓呆了。

一位工人脱下衣服，扑灭了身上的火。他被送往一家医院，他的母亲赶到医院，但是没钱交医药费，医生拒绝抢救他。他被转送到另一家医院。当晚十点，全泰一去世，终年23岁。

六年里，全泰一尝试过他能想到的全部手段，去争取改善工人生活。他用技术工人的身份庇护徒工，他宣传《劳动基准法》，他一度幻想建设皆大欢喜的模范工厂，他曾指望国家官僚的力量，他求助记者，他急切地想撮合工人的联合。他感觉到国家与资本联合构筑的铜墙铁壁。他质问：“为什么它（即国家）在明知雇主们所犯罪恶的情形下，却依然保持沉默？为什么保持沉默的，不仅有劳工监察部门、劳工部、政治家，还有媒体、宗教人士以及知识分子？”

直到死，全泰一仍未找到确切答案，他只是不愿再后退了。

全泰一自焚事件震动了韩国的工人和学生。自那以后，一大批学生走入工厂，努力参与工人斗争。八十年代中期，韩国爆发了巨大的罢工运动，改善了工人的整体待遇。但国家与资本围绕工人阶级构筑的那道墙并未倒塌，只要老板可能损失利润，工人便首先被牺牲。全泰一理想——“不再有人受到富人权势的威逼”，仍有待实现。

后记：本文中的主人公生平部分，主要取材于韩国石枕出版社的《星星之火：全泰壹评传》，韩文作者为赵英来，英译为全顺玉，中译为刘建洲。特此鸣谢。另，韩国导演朴光洙拍摄了影片《美丽青年全泰壹》，配有中文字幕，有兴趣的工友可以上网搜索视频来看。